

论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中的证伪主义思想方法论

杨建飞

摘要：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所包含的经济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事实上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作为当代自由主义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其产生、发展都深受证伪主义的影响。证伪主义的思想准则就是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波普尔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思想中对机械决定论和完全因果观的批判、对于忽视风险的、可完全执行计划的否定与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和经济自由哲学密切相关并相通；经济证伪原则引导着弗里德曼及相关研究者对于货币需求函数假说的深化、批判和反驳；波普尔证伪主义的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今天仍不失其智慧价值。

关键词：证伪主义 现代货币主义 思想方法论 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有人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在学术上一个明显缺点是与专业科学发展的脱节，从而使之未能对于科学发展起到真正的实质性作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似乎只有事后的解释功能，缺乏对于专业科学方向的预测和研究活动的指导功能。逻辑实证主义只是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马歇尔等人的新古典学派的“边际革命”和均衡价格理论提供了一种事后描述和解释框架。以库恩、拉卡托斯等人为代表的整个历史学派的“范式”、“不可通约性”、“专业共同体”、“研究纲领方法论”等，也只是为以萨缪尔森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制度学派、产权经济学等提供了一套方便的话语体系和表述语言。而只有波普尔证伪主义独树一帜，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部门，以至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部门，慰为奇观。目前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波普尔证伪主义批判理性的态度和可证伪的方法论原则、理论真理性与逼真度的评价模式、科学假说的工具主义思想、猜想—反驳的科学知识发展模式等深深渗透到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思想与行为之中，对他们的专业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马克·布劳格在总结20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时说：“证伪主义是整个20世纪的故事”，汉兹说：“在过去10年间，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发展产业，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同卡尔·波普尔的哲学联系在一起。波普尔传统比任何其他传统更能代表现代方法论话语中的优势声音。”（这当然有点夸大，它至少忽视了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波普尔的D-N模型和I-S模型等对于庞大的现代经济学的影响）。澳大利亚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艾克斯作证道：“在研究神经生物学的过程中，我一直循守着波普尔的学说。我的科学生涯的一大部分要归功于波普尔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说。”

事实上，波普尔证伪主义对于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以冯·哈耶克为领袖的伦敦学派、新古典宏观学派等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哈耶克的朋友）。波普尔证伪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成为当代自由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论准则。马克·布劳格说：“弗里德曼对于自然科学与科学统一方法论的论述，满页都是波普尔分子的味道。”我们认为，弗里德曼作为一个经济思想家和经济学大师，他本人的思想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引起了多方争论，弗里德曼并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波普尔主义者，实际上，实证主义、逻辑主义、工具主义等都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和精神，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量子基金会索罗斯风险投资运作思想都与波普尔崇尚自由、开放，寻找事物局限及边界的思想方法论密切相关。波普尔知识进化中的情景决定论思想的微观经济学方法论（边际分析）价值，其反基础主义的后现代精神趋向正在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知识经济和网络环境正对经典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边际收益递减提出挑战，使得理论经济学正面临着范式上的危机，在此我们更能感到思想大师的智慧的力量和现代价值。限于选题，本文仅对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中的证伪主义思想方法论及其影响作出一点粗浅分析。

二、证伪主义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立场

波普尔认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和归纳主义方法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其命题能够被证实（那怕是概率证实）。事实上，由于个别（有限）与一般（无限）之间的不对称，证实是不可能的，证实原则不足以揭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本质。他说：“理论要得到经验证实，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理论永远不能用经验证实。”波普尔认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科学之所以能与形而上学、伪科学、宗教

等区别开来,关键在于科学从逻辑上可以或者有可能被证伪、反驳或推翻。他说:“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或可证伪的,它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不能证伪的,就属于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从操作上看,检验或证伪科学理论的方法是一种从结论被证伪而导致这一理论体系整个被证伪的逻辑推理方法。其过程用公式表示就是: $[(t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bar{t}]$ 。在此,t是普遍命题,p是个别或单称命题, $\bar{}$ 表示命题的逆否。在证伪原则基础上的科学观和科学理论知识观导致了波普尔的大胆猜想——严格反驳的方法论框架。他认为只有自由创造,历经各种可能性,在极广的范围内,才能提出有高度抽象性和广泛解释力的理论假说,而具有广泛解释力和较高逼真度的理论假说往往容易被经验所证伪,从而剔除错误,显示出科学理论的真正的品质。在试错法基础上,波普尔提出了一种循环往复、不断超越的科学四阶段模式: $P_1 \rightarrow T \rightarrow E \rightarrow P_2 \dots$ 。

其中 P_1 表示问题,即科学开始于问题,T表示某种猜想和假说,E指经过检验、批判和证伪而剔除错误, P_2 表示新的问题,即新一轮的提问和科学探索的开始,按这种科学运行模式,科学应是开放的、无限的、发展的。

波普尔证伪主义深刻影响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立场,弗里德曼发表于1953年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弗里德曼经济方法论思想最集中的反映,也是20世纪经济方法论中被广泛引用、影响深远的论文,它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高度一致和关联。中国学者李伯聪教授认为:“这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其实是同实证主义哲学方法论大相径庭而充满着证伪主义方法论精神”。针对经验假说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证信性原则,弗里德曼说:“事实从来就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一个假说的不正确性,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有虚假的地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是一种暂时被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不仅要求对现有假设进行验证并加以完善,而且还要求不断地创立新假说。”

关于经济学理论可信度、逼真性、进步性及检验方法和标准,弗里德曼认为:“作为一个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仅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而暂时地得到接受,还是遭到了拒绝。其唯一的有关检验是将其预测与实际性作比较,如果与实际相抵触,则该假说遭到了否定。如果没有,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有极大的可依赖程度……一个理论越富有成效,它对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越精确(越易于被证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都没有确定可靠的实质性知识,只有那永远无法‘证实’但却不能拒绝的暂时假说。对于这些假说,我们可能有较多或较少信心,这取决于它们所包含的经验之广度(即这些假说本身的复杂性和与其他可供选择的假说的比较结果),以及它们已经逃过了可能遭到的拒绝次数。”^⑩他还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整个实证知识,都是通过下列途径而成长起来的,一个

暂定性的假说对于自称要给予说明的现象预测失灵,对于某一假说进行修补直到有人提出新的假说,它或者更加精致,或者只是简单地触及令人困惑的现象,如此等等,以至无穷。

弗里德曼对于科学假说的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特别作了论述,他说:“在两类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都无法得到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无法避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物理学中的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社会科学中自我成就或自我挫败和预言都是这些局限性的例证。”^⑪

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哲学

从经验证伪原则和猜想——反驳的方法论为出发,波普尔重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在批判精神、自由精神、超越精神的引导下,他认真研究了真理问题,认为探求真理是科学的任务,真理是与事实的符合。他强调真理的相对性,但也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在“三个世界”的理论中,他应用了进化论的思想,承认世界₁、世界₂、世界₃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科学理论发展的社会学原因、心理学原因和逻辑学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宏观和社会机理侧面理解科学进化的框架和视角。

波普尔坚持自由精神,反对归纳主义和机械物理决定论的立场,他把证伪主义和试错法的方法论应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部门,力图揭示科学的人性方面。他强调世界进程中的不完全性、属人性、不确定性、风险性和不可完全预测性,要求人们重视社会现实,发挥个性主体性和创造力,关注个人自由选择,努力探索,把社会推向进步。

波普尔认为证伪主义方法论和批判、自由、否定的精神与民主社会的精神及运行机制是相通的。他描述了民主社会的自由本质和由于自由(当然是理性的自由)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和收益,并对在社会历史决定论框架下极权主义社会内在缺陷和福利损失、对于传统伟大人物智慧中的自负与极权思想(如柏拉图)、对这种封闭社会形态所依赖的完全机械中定论的方法论、对于极权社会在一种一致统一体制安排下对于个人性和个人创造力的抑制等固有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否定自由、否定随机性和主体性、创新及不确定性的机械决定论。这种社会历史观认为未来与现在有齐一性,相信历史规律和命运,忽视个体。计划体制是这种思想方法的具体实现和体现。他说:“历史决定论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其实它是一种不能产生成果的错误方法。”他认为,历史决定论迷信并侈谈整体主义、神秘主义,以自然科学方法为模板,误解科学方法,对其不加限制的推广、应用。他们不承认或无力证明它们据以进行预测的理论模型的可证伪性。历史决定论事实上是一种相信和依靠超自然力量的宿命论观念,也是一种神话,是不可能的。他说:“如果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日历(计划)并且为人所知,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⑫(这一点相似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于宏观政策理性预期效应的批判与分析)。波普尔把个人和社会的现实生活看成为一个不

断提出问题和解决的过程,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助于问题解决的社会机制和组织。由于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而问题的答案也不是唯一的,因此,人们就应大胆自由、自主地提出问题,提出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案,这些方案又必须经过批判、检验和纠错,社会体制和机制应当允许并鼓励人们自由地无约束地提出不同的方案,也允许人们自由地、无约束地批判证伪这些方案。

弗里德曼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哲学和自由人假说论证与波普尔历史决定论批判是不约而同的,波普尔自由精神在弗里德曼的论著中的影响之大,以至于有时很难进行区别是谁的思想和话语在进行声明。

弗里德曼的自由人假说、自由主义哲学及保护自由,反对极权主义的态度反映在他对于经济组织形式,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的设计选择、预期和信仰上。弗里德曼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自由、保护自由并促进个人价值实现的、完善的体制,是一种在自利、自愿基础上自然产生出来的契约合作机制和组织形式,它能促进广泛的利益福利改进和个性自由空间扩展并达到帕累托最优。他说:“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都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市场是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⑩按弗里德曼的理解,正是在自由人的自愿和互利的交易基础上,正是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价格机制引导下,通过传递信息,刺激效应和收入分配,千百万个自由的个人行为得以协调,貌似只追求自身利益的当事人的行动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从后果上正好促进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也增加了自由、自主和公平、正义、平等的选择机会。

弗里德曼批评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宏观政策介入思想。他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政府角色正在变化,成为社会组织的老大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公平、正义、平等的高尚字眼下,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借口,实施了一种用福利换自由,进而维护政局和政府稳定的策略。政府当局自认为私人自由企业有内在不稳定性,会产生繁荣与萧条的波动和周期循环,因此政府权力必须强化,以平息不稳定性,保持持续增长。弗里德曼认为,事实上事与愿违,20世纪70年代日益严重的“滞胀”和生态环境危机,正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财税政策介入引起的。因此要实现稳定与发展,唯一出路是恢复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和价值观,捍卫自由企业制度,限制并减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强制权和干预。

弗里德曼在其著名的关于独立的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控制的观点的分析中表达了他的自由主义(但是是理性的)和反对任何形式极权主义的思想。以英格兰银行作为典型案例,他认为,英格兰银行是严格的私人银行,不是政府银行,也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它却发挥着良好的中央银行行为和功能。他认为,原本意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是一种控制政府干预的方式,从而用来防止货币政策成为一种受政治和政府操纵的“足球”,成为政治当局每一突发念头的所摆布的一件玩物。因此,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政策的控制是可以与立法、司法或行政权力相提并论的、平行的一种基本职责。他对中央银行的职能和目标评论说:“让中央

银行具有一种大致与立法、行政、司法方面权力相等的权力,以便在每日每时的基础上执行总的宪政授权”。但是,从效果上看,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的这种独立性不过是一种“协调、组织执政当局的最佳途径而已”^⑪。例如,一旦财政当局的筹集资金的利益与货币当局发生了严重冲突,那么作出让步的不可避免地将是中央银行,而不是财政当局。这样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事实上也是与执政当局密不可分的。因此,弗里德曼认为,拥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政治上是不可忍受的,在民主政体、开放社会和自由选择条件下,让如此之大的权力集中在一个独立于任何类型的、直接的、有效的政治控制之外的社会团体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责任的分散,促进了在不确定时期与困难时期对责任的逃避(例如,在联邦储备系统与财政部之间经常相互推委债务管理的责任),导致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过份依赖于个人品质和过份重视银行和集团的观点,增加了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种独立的中央银行事实上是明确的、彻头彻尾的独裁主义与极权主义”^⑫,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个人自由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威胁。

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哲学思想与波普尔在证伪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基础上对于历史决定论和机械因果观的批判,对于国家权力和极权主义的批判,对于那些误解并过份依赖国家的态度的批判,对于以高尚的但是抽象空洞的整体主义的旗帜剥夺个人自由选择的错误的批判等无疑是高度一致和相通的,显示出了弗里德曼经济自由哲学思想深层的证伪主义取向。同时,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体制、自由企业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反极权的、开放的社会模型和组织形态,是形成自然秩序的有效途径,也是一种典型的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和机械因果观的社会进化立场。

四、经验证伪原则与货币需求函数基本假说的边界及局限性

波普尔证伪主义认为,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在于它能够被经验所检验并为经验所证伪或反驳。科学的运行和进化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它从问题开始,在一定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利用尝试性的反驳—证明模式,经大胆猜想和灵感的释放,提出新的假说,后经逻辑推导,作出关于未来事实的预测,后将预言结论与观察事实进行对照,从而实现对于假说证实或证伪。预言事实越多,范围越广泛,可证伪和检验度越高,说明假说越具有生命力,越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反之亦然。

证伪主义认为,科学是可错的,科学是有界限的,科学不可能解释一切,不可能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是普适的,只有伪科学和毫无创新的同义反复才是万能的,没有边界和极限。因此,从证伪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深入挖掘科学的思想潜力并寻找它的极限和界限,寻找基本假说的证伪性、可错性则是专业科学的非常重要并且不可替代的实质性、创新性工作。

在创建现代货币主义的过程中,弗里德曼沿着经验主义立场,从问题出发,反对凯恩斯的宏观系统的经济分析,关注

细小问题的研究,遵守了证伪主义的研究程序,对于自己的理论模式和基本假说提出了可检验、可证伪性方面严格的要求,发挥了他在反对既成和正统理论体系上的批判才能(弗里德曼创立货币主义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凯恩斯主义作为官方经济学倍受重视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模式的年代)。他首先建立了货币数量最重要这一基本原理和前提,从此出发,建立了相关的重要理论假说,包括关于货币真实需求的货币数量假说,消费需求的持久收入假说,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自然率假说。之后,弗里德曼与施瓦茨西·库兹涅茨、卡尔·布鲁纳等人进行了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资料、历史资料的回归分析,对于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假说等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艰苦的验证、检验和分析。作为一个相信证伪主义哲学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家,弗里德曼从来没有认为他的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假设、持久收入假设、自然失业率假设是超越时空条件的。他认为,在相适应的条件下,这些假设是永恒有效的,如同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定律、微积分的中值定理一样。但当金融体制等其他变量发生变化时,由于条件不同,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就会成为问题,这就是货币主义基本假说的边界条件。他说:“……任何理论假设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真实(如果想要取得科学成就的话)。”^⑩弗里德曼认为:“正确的理论模式是这个理论能作出可能被驳倒的预测,凯恩斯理论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它被驳倒了。我描述的理论也作出了这样的预测,即我们要经历加速的通货膨胀。”^⑪内格尔等认为强调科学预测而使弗里德曼忽视了科学解释的重要性,从而走向工具主义。事实上这种观点是不完全的。伯顿认为“它只是相对于亨普尔和奥本海姆关于概念经典阐述所限定的意义来看的”^⑫。事实上,关于现代货币主义基本假设的局限性及经验上的证伪工作一直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及其追随者、反对者的重要工作方向。在那场著名的、旷日持久的、成果产出丰富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即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争论及其压力推动下,这种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基本假设的反驳与证伪,对于其边界与局限性的暴露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主义基本假设局限性和边界性又得到了金融体制变革,利率结构弹性变动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经济阶段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及高级化、现代经济运转上的复杂性、不同当事人之间货币博弈等方面的证据的支持。可以说,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基本假设的证伪工作在逻辑上、在当代经济实践上都取得了有说服力的成果,符合证伪主义规范和方法论要求。

为了证伪和反驳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假设,在货币主义学派内部和外部都取得了进展。以托宾为代表的学者改进、发展了后凯恩斯主义货币需求理论,深入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与货币需求的利率结构、利率弹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许多有力的证伪证据,从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的“可证伪性”和其“边界”、“极限”。后凯恩斯主义成员之一梅尔泽改进了托宾的货币需求公式,针对弗里德曼需求方程式,他认为,规模变量既非真实收入,又不是非人力财富,而是真实持久收入。如果又考虑

价格预期变动的影 响,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的稳定函数关系就值得怀疑。他还发现:“对货币需求,如利率弹性是非零的,不管对于长期利率,还是短期利率……弹性值大约在0.5~0.95之间。其大小在不同的年代里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⑬

1956年,弗里德曼的实证经验研究认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几乎没有什么统计意义而言。但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弗里德曼得到这一结论是因为它采用了异常的估计和预测方法。莱德勒1966年对弗里德曼引用过的同样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测算,他的结论与弗里德曼的结论大相径庭。他发现:“有明显具有统计意义的利率弹性存在”^⑭。莱德勒和帕金1970年对于英国1955-1967年度的经验数据和样本的分析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哈奇对1963-1971年的英国的样本分析亦大致如此。1978年,针对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假说,考夫兰总结说:“不在存在一个一般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够适用于任何货币主义”^⑮。

作为新古典综合派领袖和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的萨缪尔森,他针对1979-1982年间美国中央银行按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管理货币规划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得极不稳定这一事实,对现代货币主义提出了逻辑和理论上的批判。他说:“货币主义者忘记了‘卢卡斯批评’。卢卡斯指出,当人们面临不同类型政策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行动。正如显而易见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当凯恩斯主义者企图操纵它的时候,它便在他们手中彻底崩溃一样,当你企图依靠把货币保持在固定增长率路线上来管理经济时,显然为了稳定经济的、固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也会消失。就像美国1972年间至1982年期间所作的那样。事实上,1982年货币主义不亚于凯恩斯主义者,也绊倒在卢卡斯批判上。”^⑯

1987年布林德说:“毫无疑问,80年代早期稳定货币需求函数的崩溃被证明是一次对于皮尔斯所说的坚不可摧的货币主义的巨大冲击。结果,货币主义在学术圈内和政策制订者中都遭受到了重创。”^⑰

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会否认货币需求函数利率弹性的存在,只是弹性大小不同而已。此外,规模变量选择,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性,经济制度的开放性和影响程度也是后凯恩斯主义实证研究并力图发现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假说局限性和边界、力图从经验上对之进行证伪的潜在的工作方向。从证伪主义关于科学知识发展的判断来看,他们的反驳工作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和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是有价值的。

马克·布劳格评论说:“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已经失败了,货币主义从未能够成功地阐明产生其经验结果的因果机制,有时候甚至否认这些结果需要用坚实的因果理论去解释。此外,它也没有能够驳倒它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任何笨拙的歪曲”。接着他又说:“很明显,经济学家不会在经验的反驳之前轻易缴械”^⑱。有人认为,这相当于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范式中波普尔证伪主义式的对于经验的“免疫”,拉卡托斯研究纲领式的“韧性”。我们认为,这无疑已经反映了现代货币主义基本假说的边界性,但同时也

说明了其经验证伪工作的曲折性、复杂性。

我们认为,在著名的卢卡斯批判中,作为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新古典宏观学派的领袖,卢卡斯事实上应用了博弈论、对策论等强调不同主体和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强调复杂性、多向性以至非线性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上进行创新,独树一帜,分析深入,得到了许多独到而重要的结果,富有智慧和思想方法上的启发,引起我们深深地思考。这也说明,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它们局限在经典牛顿力学、完全信息、完全决定论、忽视不确定性的方法论框架之中,在许多问题分析上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具体性。因此我们大胆地认为,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系统动力学等新方法出发,在对弗里德曼现代货币主义的证伪主义分析中,在寻找现代货币主义基本假说的边界和局限性上,还存在着其他新的、不同方向上的创新工作以及经验事实证据,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和验证,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前沿意义的课题。

注释:

- ②③[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105、115、2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Hands, D. W., 1993. Testing, Rationality and Progress. MD: Bowmon & Littlefield.
参见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38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
[英]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文版,7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参见夏基松:《西方科学哲学》,13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李伯聪:《略论经济学哲学中的波普后方法论》,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6)。

⑪《弗里德曼文集》,中文版,196、227、230、198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⑫[美]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货膨胀和失业》,见《现代国外经济论文选》,第2辑,1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⑬[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文版,1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⑭[美]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中文版,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⑮⑯[美]弗里德曼:《货币政策效果的时间滞后》,见《最适货币数量论文集》,中文版,555、558页,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4。

⑰⑱[英]约翰·伯顿:《注重实证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见《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中文版,62、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⑲⑳[英]布赖恩·斯诺登等著:《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述现代宏观经济学》,中文版,153、1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㉑Meltzer, The Demand for Money: The Evidence from Time Ser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1, pp. 219 ~ 246.

㉒Nedler, Some Evidence on the Demand for Mone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74, pp. 55 ~ 68.

㉓Coghlan, 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Money,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Vol. 18, pp. 48 ~ 60.

㉔[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文版,561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69)
(责任编辑:N)

(上接第35页)一门技术几年之后便失去市场。因此人们就不得不重新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这种积累又不同于人力资本在原有基础上的简单的补充,也不同于人力资本简单完善,它是新知识、新技术的不断掌握,并且这种新知识新技术的掌握不可能仅仅通过生产中帮传带一些操作上传授就能达到,而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理论上的再深造。因而也就要求人们工作之后必须不断地返回学校重新学习,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今知识爆炸的需要,技术更新的需要。

因此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的变化使得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大幅增加,并且可以预见随着经济更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仍将继续增大。这就要求社会必须供给相应的教育,否则人们的教育需求无法得以实现和满足;另外为了适应在职培训,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应该给予一定制度安排。事实上,目前绝大部分企业对在职培训很重视,很多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培养体系及基地,通常至少每年培训一次,有些甚至每月轮训一次。

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使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要手段,而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的缩短则使教育愈来愈终身化。目前不仅需要“学习型组织”的企业理念,而且也应该有“学习型社会”的社会理念;学校教育不再为某些社会强势集团所独享,而且也不再是某些年龄段下的专利,它应该是大

众化以及终身化。这是时代变迁的特点在教育理念上的具体反映,应该说我国2001年开始的大学入学考试取消年龄限制的改革是对这一教育理念的呼应。

事实上,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的变化不仅扩大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而且也改变了人们所需教育的内容和方向。这表现在教育理念及目标的改变上,具体体现为人们所受教育的目的不再仅仅是知识技术的简单掌握,而且也是对知识技术学习能力的锻炼与培训,应该说对这种能力的培养与锻炼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同时人们在学习过程中也不再仅仅重视专业知识技术,而且也更重视基础知识,因为与专业知识相比,基础知识具有周期长、淘汰慢以及变通灵活的特点,因此在人力资本生命周期日益缩短的今天,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是规避教育风险的最佳选择。因此人们在学习过程中不应该过早地接触专业知识,也不应该将自己的知识锁定在某一狭窄的领域,而应该是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尽可能地进行知识技术的储备。前些年我国高校所进行的专业学科合并与调整应该是这一教育观念在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N)